

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[将军年谱]



雷震(1906—1993),今武汉市黄陂区人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任红4军12师36团排长、连政治指导员、营政治教导员,红9军27师79团政治委员、师参谋长、团长,红四方面军第4局第1科科长等职。参加了长征。

抗战时期,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、山西游击第10团团长沙、八路军129师386旅16团团长,太岳军区中条山军分区司令员等职。

解放战争时期,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、吉林军区副司令员、吉北军分区司令员、吉林省军区参谋长、第四野战军第45军参谋长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任解放军第48军副军长、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、福建省军区司令员。



雷震将军获颁的勋章。



9月中旬,雷震将军之女雷立宪在武汉接受采访,讲述父亲的长征经历。



扫码看视频

雷震：雪山顶转眼痛失数十名战友

■长江日报记者张奕宁

九峰山烈士陵园,松柏苍翠。每年清明,雷立宪都会带着儿孙来这里祭扫父亲雷震和母亲李爱民。孙子在作文里写下太爷爷太奶奶的故事,研学时还专程去了娄山关。

9月14日,长江日报记者在武汉见到了雷震将军的女儿雷立宪。她今年72岁,在家里排行老七。

雷立宪拿给记者一份42页、共18章的雷震口述回忆录,里面记录着父亲的革命故事。

不当连指导员,先当战士

1906年,雷震出生于湖北黄陂尹家冲湾的一个贫农家庭,家中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。据雷震口述回忆录记载,他父亲常年在汉口码头做苦力,母亲靠织花边、缝补、浆洗维持一家生计。

“父亲回忆,小时候家里终年靠野菜和大麦糊充饥。”雷立宪说。雷震仅一岁半的弟弟饿死在母亲怀里。

雷震8岁那年,母亲因常年劳累病故。他被大伯收留,每天放牛、砍柴。10岁后,他又跟着四叔,到离村子十几里远的地主庄园种庄稼。冬天赤脚下山,他脚上的冻疮一道道裂开,疼得钻心,十三四岁时,他已挑得动100多斤的担子。可一年辛劳下来,到年终交完租子,仍两手空空。

长大后,雷震在染坊、裁缝铺当过学徒,出师后找不到稳定活计,只能四处流浪。雷立宪说:“父亲告诉我,那个时候他常去姐姐家‘偷偷要饭吃’。”但次数太多,雷震也不好意思了。

1929年春节前后,雷震听说家乡“闹共产党”,又听说“跟着共产党就有饭吃”,便决定回乡寻找共产党。“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是个穷小子,没有多高的思想觉悟,一听有饭吃,就去找共产党了。”

回乡第3天,雷震就遇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。从刚刚从汉口回来,雷震一度被误抓。赤卫队查明其身份后,准备放他回家,没想到他坚决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。

雷震告诉赤卫队的人:“我已经没有家了,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共产党。”就这样,他被留下当了交通员。同年8月,雷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雷立宪告诉记者:“父亲入党时已经23岁了,虽然识字不多,但接受新知识很快,思想觉悟也提高得很快。”

入党后,雷震逐渐明白,参加革命不只是单纯地打土豪、分田地,更是为了让和自己一样的劳苦大众摆脱贫困、争取解放而奋斗。1930年2月,雷震参加红军,后被编入红4军12师36团3营9连。

雷震曾回忆:“虽然红军生活很艰苦,但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。我要求永远跟着共产党,革命到死绝不回头。”

参加红军时,雷震已担任乡苏维埃的主席,组织原本打算让他直接担任连政治指导员,他却认为自己对部队还不熟悉,要求先当战士。不久后,他从副班长成长为连政治指导员。

尖刀连打到最后剩30多人

“我父亲一生打过不少硬仗,重伤3次。”雷立宪说。1932年,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期间,红四方面军第12师第36团奉命从麻城撤围,驰援黄安(今红安)。

8月11日清晨6时许,部队赶到黄安县城外,刚埋锅做饭,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得知敌军已向黄安进攻,紧急部署36团率第2、第3营立即出发阻击。第3营担任全团前卫,9连为尖刀连,走在最前面。

部队在黄安县城以西20余里的冯寿二丘陵地带与国民党军卫立煌第六纵队迎头遭遇。据雷震口述回忆录记载,敌军人数超千人,装备精良;红军每营不足300人,大部分战士使用旧式步枪,每人子弹3至5发,手榴弹3至4枚。敌我力量悬殊。

上午10时左右,战斗打响。敌军凭借炮火和机枪掩护,穿过稻田向红军阵地逼近。待敌人进入射程,红军突然开火,前排敌人成排倒下,后面的敌人又涌上来。弹药打光了,战士们索性跃出工事,抡起大刀、挺起刺刀,与敌人展开白刃战。

雷震生前回忆,战士们大喊“杀——嘿”,与敌人反复冲杀十余次。

雷震身负重伤,仍带领全连坚守阵地,并不断重申战场纪律:活不缴枪,死不丢尸,轻伤不下火线;干部负伤或牺牲,由下一级干部接替;如果干部全部倒下,就由战士自



雷震将军夫妇和9个孩子的合影。

主报名代理。

激战至下午4时,36团已鏖战数小时,疲惫之际,1营赶到增援,全团发起反攻,敌军溃退。战斗结束时,雷震所在的9连,连同轻伤员在内仅剩30多人。

“父亲不怕牺牲,作战十分勇猛。”雷立宪说。正是这股猛劲,雷震在战火中不断成长。长征时期,他历任红9军第27师第79团政治委员、师参谋长。

牺牲的同志或站或坐,像活着一样

1935年1月22日,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,配合中央红军行动。雷震生前写道:“我们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,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。”

1935年3月28日,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,在四川苍溪等地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,由此踏上长征征程。1935年8月初,红一、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、右两路军北上。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,包括红9军、31军、33军。

“父亲生前说,长征途中的艰难困苦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要想甩掉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追兵,就必须走一条常人无法通过的险途——翻越高耸入云的大雪山,跋涉渺无人烟的草地。”雷立宪说。

然而,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,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格外曲折艰险,三过雪山草地,一路行军作战,付出了巨大牺牲。

“父亲生前常向我们讲他的故事,但有次爬雪山的经历,他讲过很多次。”雷立宪说。

夹金山位于宝兴西北、懋功以南,海拔4000多米,常年积雪。当地藏民称大雪山为“神山”,认为除了神仙,连鸟也难以飞越。

雷震时任红9军第27师第79团政治委员。翻越前,藏民告诉了他三条规矩:要夜间通过,白天风雪大,难以翻越;途中不能大声喧哗,以免“惊动山神”;无论多累,人、马都不能停下来休息。

在战士们看来,这些说法带有迷信色彩。雷震认为,宁可信其有,也不能拿战士的生命冒险。他反复动员,要求全团严格遵守。第二天下午,部队开始登山。山风裹着雪花,寒气逼人。单薄的军衣难以抵挡严寒,越往山顶走,空气越稀薄,呼吸越发困难。有人头晕腿酸,一步一停;有人实在走不动,坐下来休息,便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
“牺牲的同志,有的站着,有的坐着,在黑暗中看,仍像活着一样。”雷震写道。天亮时,第79团终于登上山顶。劫后余生的战士们一阵兴奋,很快忘记了此前的约定,有人欢呼、唱歌,甚至朝天鸣枪。

风雪骤然袭来。狂风裹挟着冰雹,部队顿时陷入险境。据雷震回忆,不到半小时,全团有三四十人伤亡。

“父亲后来才知道,这哪是什么惊动山神,是因为山高空气稀薄,气候瞬息万变。”雷立宪说。

经过3个多小时紧急转移,伤员和被困人员才转至山脚下一处草地。看着并肩作战的战友倒在雪地里,这位平日不轻易落泪的硬汉,放声痛哭。

“父亲从小生活在南方,哪懂得冻伤后不能立即烤火。”雷立宪说。

看到冻伤战士瑟瑟发抖,雷震心疼极了,立即让人砍来柴火,在伤员周围生火取暖。这一幕被刚下山的朱德总司令等人看到,雷震随后受到批评,还差点挨处分。朱德看到雷震双手有枪伤,又得知团长负伤就医,遂向他讲解冻伤救治方法,并要求妥善

掩埋牺牲战士。

“直到晚年,父亲始终忘不了这次经历。每当提起,他既感念朱总司令的恩情,又满心愧疚,眼里泛着泪光。”雷立宪说。

翻越雪山之外,日夜行军也是雷震生前向儿女讲过的难忘往事。

“父亲说,为了躲避敌军围追堵截,部队必须不停赶路。碰到山就爬山,碰到水就涉水。”雷立宪说,他们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,反正一个跟着一个,晚上也要急行军。

“摸黑赶路,最怕的就是前面的脚步声突然消失。”雷立宪回忆,父亲曾说,队伍行进中,一旦前方突然没了动静,大家就知道遇到了险情,只能绕道而行,继续赶路。

就这样,一路上不敢停下来。抵达宿营地清点人数时才发现,队伍少了不少人。

回忆往事,心情沉重到吃不下饭

记者采访雷立宪的地方,正是雷震晚年居住的寓所。房屋1999年翻修过,走进一楼,正中挂着雷震夫妇的照片。

雷震与李爱民在延安结婚,育有9个子女。孩子们的名字颇有时代特色——1944年在延安出生的大女儿取名“延平”,寓意“渴望祖国早一天和平安宁”;后来出生的弟弟妹妹,名字也大多与时代有关:光复、胜利、国庆、汉生、新建、立宪……这些名字,寄托着雷震对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期盼。

雷震不善言谈,话很少。关于自己走过的革命岁月,他很少向子女提起。今年82岁的长女雷延平住在合肥,雷立宪通过视频连线姐姐,谈及父亲的长征经历时,雷延平摇了摇头:“父亲生前很少讲这些事。有时候,我们看到他望着窗外叹气、发愣,就知道他可能又想起了那些往事。”

那些埋在心底的过往,也只有在国庆节、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特殊日子,或者观看有关革命影视剧时,才偶尔露出一角。

有一次看电影《万水千山》,孩子们问:“长征是这样的吗?”雷震点点头,又说:“比这个更苦。”

1982年,为留下革命史料,原武汉军区后勤部组织老红军口述革命经历,雷震听说后很配合。组织上让雷延平从合肥回武汉,为雷震记录。那年,雷震76岁。

雷立宪记得,每当讲到激动处,父亲就“满脸涨红”,不得不停下来休息。“每次口述完,他的心情都很沉重,饭也吃不下。”雷立宪回忆,父亲说:“身边的战友、领导都不在了,亲眼看着他们在战场上牺牲,一回想就很难受。”

这次口述前后用了两个多月,最终整理成18章、42页的文字记录。

1993年4月,雷震在武汉逝世,享年87岁。

遵照父亲遗愿,家人将部分骨灰撒在湖北黄陂木兰山。这里是他的家乡,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。

在那里,家人种下一棵松树,四季常青。对雷震的家人来说,这棵树寄托着对父亲的怀念;而父亲留下的革命荣誉,则承载着他为祖国奋斗的革命岁月。

2017年,雷震的子女将父亲生前获得的一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,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

“我们相信,父亲的荣誉在那里,父亲的精神在那里,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魂也在那里。”雷延平说,“那里,是它们最好的归宿。”

[故事]

两次折返 背伤员过江

1932年10月,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,向西转移,翻秦岭、渡汉水、越巴山,历时两个多月,于12月下旬进入川北,开始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
雷震生前回忆,两个多月的西征路上,前有杨虎城部队和川军阻截,后有敌军追击,“天天打不完的仗,行不完的军”。

一个寒冬的黄昏,红四方面军刚翻过秦岭,到达汉中平原的汉水岸边。江水宽约二三里。浅滩处已结起冰凌,中间水流湍急,波涛像猛兽般吼叫。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,面对几乎没过胸膛的江水,一时望而却步。

“同志们,我们在战场上比赛杀敌打胜仗,今天来个渡江竞赛吧!”雷震喊道。

说完,雷震和连长率先脱下衣服,跳进冰冷的江水。战士们紧随其后,把衣服顶在头上,枪支弹药高举过肩,伤员包扎好伤口,以班为单位,手挽着手向前渡江。

江水湍急,越往江心越深。走在雷震前面的两名伤员被急流冲得失去重心,雷震先后两次折返,将他们背过江。

部队默默前进。忽然,人群中响起歌声:“鸡子叫来狗子咬,红军哥哥回来了……”

歌声越来越响,压过汉水的波涛声。上岸后,战士们湿透的衣服结了冰,硬邦邦的,不少人的腿脚也在蹬水时被冰屑、石块划出一道道血痕。

这次夜涉汉水,也在雷震身上留下了终身的印记。“我的小腿由于静脉曲张,在长时期内,逐渐形成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,就是过汉水时留下的纪念。”雷震生前说。

“我父亲身经百战,身上留下了很多伤。大腿、胳膊上都有弹孔留下的凹痕,右手小拇指也因负伤一直弯曲,无法伸直。”雷立宪手演示父亲小拇指弯曲的样子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雷震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。

“在他面前, 我们就是兵”

在子女眼中,雷震是一位极其严格的父亲。

“父亲不爱说话,一般人都跟他说不上话,语言特别短。”雷立宪说。

“我们家训非常严格。第一,任何时候都要跟着共产党走;第二,一定要搞好本职工作;第三,生活一定要艰苦朴素。”雷立宪说,父亲要求子女上班不许迟到早退,不许睡觉;虽然家里请了阿姨,但子女必须帮忙洗碗、打扫卫生、扫院子。生活细节上,雷震也管得很严,“吃饭不能讲话,阿姨做什么吃什么”。

“在我们面前,他就是首长,在他面前,我们就是他的兵。”雷立宪说。

雷立宪被送到山西野战医院当兵时,条件艰苦,她想通过母亲让父亲找关系调回武汉军区。“父亲当场拒绝,说哪有这种事情,到部队去就要好好干,不管在什么地方,一定要干好。越艰苦越要干,哪还搞什么调动?”母亲只好写信给女儿,信中说:“你安心服役吧,这个事办不了。”

雷立宪心里也有委屈。可日子久了,她慢慢明白了父亲那份严厉背后的深意。“他管得严,是怕我们走歪路,是希望我们靠自己站起来。”

她说,父亲虽然嘴上不说,但心里对子女是有爱的。如今再回头看,她越来越理解父亲当年的用心。“我们这一代人,能吃苦、能自立,跟父亲当年的教育分不开。现在想想,真的要感谢他。”

(长江日报记者张奕宁)